

# 论周光倬的滇缅边界调查

肖瑞滢

(云南大学 历史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班洪事件发生后, 南京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外交部派员赴滇缅边界调查, 以供交涉参考, 周光倬被任命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为了此次调查, 周光倬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采访了熟悉班洪事件的官员、亲历班洪事件的土司、有滇缅南段勘界经历的人员, 并展开调查, 其工作思路与方法值得肯定。周光倬完成的《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 有助于南京国民政府了解班洪地区的真实情况, 对后期中英滇缅边界会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周光倬; 滇缅边界; 班洪事件; 滇缅边界调查日记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2) 05 - 0045 - 06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22. 05. 007

## Discussion on Zhou Guangzhuo's Survey of Yunnan-Myanmar Border

XIAO Ruiy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After the Banhong incident,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decided to order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general staff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send personnel to investigate the Yunnan-Myanmar border for negotiation reference. Zhou Guangzhuo was appointed as the “special border Survey Commission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Yunnan”. Zhou Guangzhuo made adequate preparations for this Survey. Zhou Guangzhuo investigated the Yunnan-Myanmar border by interviewing officials who knew about the Banhong incident, chieftain who experienced the Banhong incident, and personnel participating in the demarcation of the southern Yunnan-Myanmar section. His working ideas and methods are worthy of recognition. Zhou Guangzhuo completed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the Undefined Boundary of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Yunnan-Myanmar*, which is helpful for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Banhong area, and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later Sino British joint survey of Yunnan-Myanmar border.

**Key words:** Zhou Guangzhuo; Yunnan-Myanmar border; Banhong incident; Survey diary of Yunnan-Myanmar border

1933年12月, 为了攫取位于班洪炉房的银矿, 英国当局出动大批人员进入云南的班洪、班老地区。1934年1月, 班洪当地人民与英方展开激战, 冲突持续到同年6月, 史称“班洪事件”。当地人民奋勇抗争, 其中景谷县团防大队长李占贤组织了“西南民众边防义勇军”助战。在昆明则有爱国人士成立“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 声援班洪的抗英斗争<sup>[1]</sup>。1934年1月至3月, 身为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的王占祺与英方多次交涉, 但英方坚持未越过黄线(即陈刘线), 并以私人方式和正式信函强调此事<sup>[2]</sup>。

1934年3月18日, 旅京滇人因西南边防紧急而组成的云南旅京同乡会<sup>[3]</sup>, 开会讨论此事<sup>[4]</sup>。3月21日, 云南旅京同乡会推举代表张凤岐等20余人, 向中央请愿, 要求中央向英政府提出交涉, 并派代表到滇缅边界调查<sup>[5]</sup>。3月24日, “我外交部向英使馆严重抗议, 提议派员勘界, 并由外交、军政、参谋三部会同派员前往调查, 同时更决定对班洪交涉之进行步骤。(一)电滇省府, 派员察勘边界。(二)会同陆地测量局研究滇缅界址。(三)照会英国在此问题未切实解决以前, 不得再有任何行动, 以免益滋误会。(四)呈请中央选派参谋李

收稿日期: 2022 - 06 - 15

作者简介: 肖瑞滢(1998—), 女, 黑龙江双鸭山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学研究。

元凯、杨光荣为勘界正副专使，会同外部所派外交专员，暨陆军测量局高级测量员，从事勘察。（五）由外部事先照会英使，请该国推派代表，会同前往班洪实行勘界。”<sup>[6]</sup>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外交部两部派员赴滇缅边界调查，以供交涉参考，参谋本部决定派遣李元凯，外交部本意打算派遣有滇缅界务工作经历的尹明德，后因云南旅京同乡会反对作罢<sup>[7]</sup>。1934年4月5日，应滇省旅京同乡电召，滇籍军官赵云岸到南京，报告滇缅界务沿革。同日，蒋介石召李元凯赴赣，咨询一切，并指示勘界事宜<sup>[8]</sup>。4月18日，经云南旅京同乡会举荐，周光倬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周光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班洪事件及滇缅南段未定界情况。1934年6月10日，周光倬一行从南京出发，于同年7月1日到达昆明。在昆明，周光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至1934年10月23日才从昆明正式出发。1935年5月8日，周光倬等人返回到玉溪，结束调查后写成《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

目前，学界对班洪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佤族人民的抗英行为<sup>[9-14]</sup>、云南地方管理机关及国民政府的应对<sup>[15-17]</sup>。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使用周光倬著、周润康整理，2015年出版的《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sup>①</sup>。关于周光倬的滇缅边界调查，仅有苑世林从地理考察的角度探讨了周光倬调查工作所涉及的民族、物产、界务、教育等方面<sup>[18]</sup>。

因此，本文以《滇缅边界调查日记》为基础史料，辅以其他材料，围绕周光倬的准备工作、周光倬滇缅边界调查的经过、周光倬边界调查的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 一、周光倬在昆明的准备工作

到达昆明后，为调查滇缅边界，周光倬展开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其一，收集资料。周光倬收集到涉及滇缅边界的资料除了相关官员所著的书籍，还有滇缅南段未

定界的档案、志书、地图等。1934年7月4日，《滇缅边界调查日记》云：“借来陈崑山所刻之《宦滇存稿》一书，托实若觅人代抄”<sup>[19]15</sup>。7月5日，“阅南段未定界档案，以陈灿及石鸿韶两人之存案较有关系，托陈科长代觅书记抄眷。三时至实业厅晤实若及吴漱泉先生，谈请代抄关于档案事”<sup>[19]15</sup>。7月27日，“借得关于界务书、志书共十二册，其中最有关系者为黄云生《滇南界务陈牋》、薛叔耘《滇缅划界图说》二书，拟觅人代抄稿”<sup>[19]28</sup>。9月17日，“看《顺宁府志》”<sup>[19]49</sup>。9月20日，“看《永昌府志》，顺手摘录，所搜的材料亦不少”<sup>[19]50</sup>。

查勘滇缅南段边界，地图尤为重要。因此，周光倬专门收集了云南省政府绘制的滇缅边界南段地图。1934年7月24日，“得见民国十四年（1925年）该局派[员]所测南段未定界之编撰图为十万分之一”<sup>[19]26</sup>。9月7日，“王玺君来，讯其测量局地图印就否，并催其将所绘地图赶出”<sup>[19]45</sup>。9月12日，“访测[量]局赵局长谈所印地图，知于日内可以印出”<sup>[19]48</sup>。

其二，筹措资金。云南省政府向周光倬等人提供资金支持，周光倬等人可在沿途分兑。1934年7月14日，“由陆厅长处知昨日省会议对于中央此派来之任务仍赞助进行”<sup>[19]19</sup>。10月19日，“向财政厅拨兑滇票新币三千六百元（合旧币一万八千元），分由大理、永昌、腾冲、镇康、澜沧、普洱等六县分兑”<sup>[19]62</sup>。

其三，拜访官员以及对滇缅边界有所了解的知名人士。其拜访原因为：一是疏通关系，以便准备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征集众人看法，以便了解班洪事件原委。其中，所拜访官员有龙云、卢汉、缪云台、丁兆冠、顾视高、陆亚夫、周钟岳等；知名人士有陈一得、秦璞安、李景森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李景森，他是云南缅宁（今临沧市）人，其在《葫芦王地概况》一文中，曾提出开发葫芦王地的建议<sup>[20]</sup>。1934年7月13日，周光倬与李景森谈及班洪事件，日记云：“据彼云前后共到过四次，此次事件实由于政府对于汉奸马美廷、宋忠福驾驭之失策所致”。周光倬根据李景森的意见，其认为

<sup>①</sup>《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是由《滇缅边界调查日记》《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回滇调查班洪的任务及感想》《呈蒋介石信》《云南边疆之危机》五个部分组成的。

有三点要注意：一是炉房位置是否在黄线之外；二是团结葫芦王，使其共同抵御英人；三是使汉奸马美廷、宋忠福内向<sup>[19]18-19</sup>。李生庄的《云南班洪问题之真相》<sup>[21]</sup>在讨论班洪事件起因时，其中“利之所在人”所指的就是马美廷、宋忠福二人。这足以佐证李景森所说的真实性。

总之，周光倬在昆明期间所收集的资料，为接下来的实地调查提供了参考；所筹措资金，为后期调查提供了经济支持；拜访官员及其对滇缅边界有所了解的知名人士，为后期更好地调查班洪事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二、周光倬对滇缅边界的调查

身为外交部特派专员，周光倬“所负的使命……是班洪问题”<sup>[19]413</sup>及“调查未定界实情”<sup>[19]176</sup>。为此，他采访了三类人：一是对班洪事件了解的官员，二是亲历班洪事件的土司，三是参与过划界的人员。

周光倬于1934年7月抵昆明，10月从昆明出发，经楚雄、大理、保山、腾冲、镇康，到达孟定，又到勐角、勐董，经岩帅、双江赴澜沧、孟连，然后从勐遮、勐海、景洪转普洱，最后沿宁洱、磨黑、元江于1935年5月返回昆明。

首先，在路途中，周光倬访问了部分对班洪事件比较了解的官员。如到大理，周光倬访问了赵钟麟，并与其讨论班洪事件。赵钟麟认为，班洪事件的“远因由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缪云台之处置失当，派美国工程师卓柏往调查，仅由缅甸往班洪，随即由缅出省。其所上意见，以为无开采之价值，即其地亦应属缅甸。事干边界，妄事定论，影响不小。此其内容必系勾结缅甸工程师伍波澜之故。近因则由于东北丧失，英人观此，始乘机侵入。实则果能于北伐军胜利时即着手经营，先下棋一盘，则当时英人退谦，何致蕴染至今，而引起此恶果”<sup>[19]78</sup>。到腾冲，周光倬专门拜访了李曰垓，李曰垓是云南腾冲人，时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署督办。李曰垓对滇缅界务极为重视，其1930年所著的《滇缅界务说略并图》分为四章：界务之分段、南段之损失、北段之延误和今后之补救<sup>[22]</sup>。班洪事件发生后，李曰垓向云南省政府报告班洪情况<sup>[23]</sup>。在昆明时，外交部来电要求周光倬“尊重地方意见之处……以第一殖边督办李子畅先生意见

较有办法”<sup>[19]29</sup>。1934年12月14日，李曰垓向周光倬谈及：“此次班洪之事变，原于班弄之首马美廷、户板领袖段子光（保山人）、贵概厅土司杨文炳三人为主，又加一宋忠福，相连一气向银公司献媚，为之动心。由马美廷先运动班老，已接受。再向班洪、永班疏通。班洪本为长房，见此事于己不利，遂与班老联合，誓不承认，乃事先讨伐班老。马美廷遂率兵进攻班老，烧毁其寨子。而[后]进攻班洪，占炉房。斯时又恰遇李占贤出兵，大受损失，对方所得不偿所失，于是杨文炳首先退出，而老银厂不料受此挫折，颇为懊丧。英政府深怪马等之[人]欠斟酌，皆受申斥，遂告失败。实则此事之起，皆由于班洪之攻班老也。”<sup>[19]125</sup>

其次，通过官员了解班洪事件本身，远远不够。班洪事件发生后，班洪等地的土司以武力对抗英军，因此慰问土司是了解事情真相的另一途径。如周光倬到达孟定等地土司管理的地区，给土司送礼以表慰劳。孟定土司罕中兴、耿马土司罕富廷、班洪小王胡忠汉等人，均参加过抗英的战役，其中孟定土司、班洪土司是班洪事件中较为核心的人物，此外，由于班洪王胡玉山于1934年10月去世，所以周光倬未能见到此人。

1935年2月6日，到达孟定后，“送与土司礼物——计花缎马褂料、袍料各一份，毡帽一顶，党国旗，风景片本，总理遗教表解，总理像，徽章，丝棉线、针一包，火腿罐头半打”<sup>[19]177</sup>。2月15日，到达班洪，“告以此来代中央政府慰劳，所送礼物极微末，不过略表情意而已”，班洪土司则“表示欢欣之感，并述时时受惊之苦痛，不能不望政府求援”<sup>[19]187</sup>。3月8日，到达澜沧县上允城，见刀氏土司，“赠以总理遗像、□帽、党国旗及个人相片”<sup>[19]216</sup>。3月12日，到达佛房，“购得铁机绣马褂及长袍料一套，以赠送孟连土司”<sup>[19]222</sup>。3月17日，见募乃土司石玉清，“赠以私人像片及徽章两枚”<sup>[19]224</sup>。

在孟定、班洪等地，周光倬还呼吁土司边地不能不争。1935年2月5日，“慰劳土司并便告以边地不能不争”<sup>[19]176</sup>。2月15日，告以“对于土地，寸土尺地皆不让步，必达到班洪地方之希望”<sup>[19]187</sup>。

周光倬向土司赠礼和告诫土司寸土不让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周光倬所赠，除了一些物质

礼物,还有象征意义之物——党国旗、总理像、总理遗教表解及徽章等。周光倬送给土司们代表国家的党国旗等物,有助于增强土司等边地国家的观念,加强中央与地方土司之间的联系;而告诫土司寸土不让,实际上是向土司灌输现代领土观念,国家由人民全体组织而成,国家领土属于国民全体,守土固边是土司民众的责任,有助于宣传和强化现代国家观念,培养土司与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最后,向参加过勘查滇缅南段边界的人员了解情况。如罕定国、李师爷、孟定岳新爷,是对滇缅边界较为了解的人员,周光倬对他们做了详细的采访<sup>[19]176-178</sup>。周光倬还访问了班洪土司高耀恒<sup>[19]180</sup>。此外,周光倬又进一步收集档案、地图等资料。如1935年3月12日,周光倬与澜沧县县长旃德荣交谈时谈道:“知县署存有陈、刘勘界时所用之汉文图一张,此图殊可宝贵,中央欲寻此图不得”<sup>[19]221</sup>。到达普洱后,周光倬在第二殖边办公署休息。4月20日,“看督署所存界务档案。将关于案件经过者,及关于沿边外交案件,分别圈出……见班洪附近一略图,尚调查较详,拟自绘”<sup>[19]269</sup>。

### 三、周光倬滇缅边界调查的价值

调查结束后,周光倬完成了《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曾任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中国委员的张凤岐认为,该报告书的内容对滇缅勘界没有起什么作用。对于周光倬的调查工作,张凤岐与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严德一认为“无结果”。时人评价该报告书和此次调查工作时,多沿用张凤岐与严德一的观点。但是,笔者研究认为,周光倬的报告书及其调查工作则有一定的价值。

《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的内容包括边界地区概况<sup>①</sup>、调查班洪与班弄间情形、南怕河流入南汀河附近一带接麻栗坝已定界与未定界的情况、会勘南段未定界意见和滇缅南段未定界之边防与国防意见等。

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是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意见。周光倬认为在条约中,有推翻条约的可能性:一是图约(薛福成所签图约)经纬度与实地部位不符;二是图约所载与事实不符;三是签字所

载地名与事实不符;四是分水岭之错误;五是图约对于南卡江定界之错误。关于勘界时应注意的事宜,周光倬建议我方委员应设法避免由滇省内地会勘,并对会勘由内地行走的路线、由缅方行走的路线、将测量问题分为天文测量分组路线、地形测量分组路线,以及会勘时间问题等均有考虑,而且强调公明山、西蒙山、索麦等地的重要性。

关于《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的价值,张凤岐指出:“周氏曾写出《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内容空泛,无新的创见,对界务会勘实际工作,不起什么作用。”<sup>[24]</sup>张凤岐所谓“无新的创见”,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周光倬报告书的内容,与曾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外交特派员的张维翰1928年《拟陈滇缅界务意见书》中滇缅南段“我方交涉应持之理由”<sup>[25]</sup>,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其所谓“对于界务会勘实际工作,不起什么作用”的评价有失偏颇。比如,关于勘界时应注意的事项,周光倬建议我方委员应设法避免由滇省内地会勘,将测量问题分为天文测量分组路线、地形测量分组路线以及会勘时间的考虑等,这对后期的勘界工作均有所帮助。其中,关于会勘时间,周光倬认为干季适宜会勘,而“干季自十一月至翌年三四月为止”<sup>[19]395</sup>。1936年4月,在中英会勘滇缅界务时,工作就因瘴气而停止<sup>[26]</sup>,由此表明周光倬所建议的会勘时间是合适的。再者,因班洪等地土司厌恶英人,所以周光倬不建议在滇省内地会勘,并提出具体的测量路线,这均对后期的中英会勘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节省时间,以及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关于这次调查工作,张凤岐认为:“外部专员周汉章,参部专员李元凯抵滇,一因英方阻止深入,外部训令只能在司格德拟议线以东调查,又因专员缺乏边界常识,意见不合,自相攻讦,引起滇省民众之反感,且迟迟不就道,中央糜耗巨资,致无结果而返。”<sup>[27]</sup>严德一也持类似看法,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英人组织公司,派兵经营,于班洪邦弄交界处银矿坝,修兵房,筑车路,滇人大哗,纷至南京外交部请愿,向英力争,遂由外交部派滇人周光倬为勘界专员,会同参谋本部专员李元凯前往调查真相,乃先内自争执,羈迟就道,后

<sup>①</sup>边界地区概况的内容有孟定概括及对国内外交通路线、班洪区域概况、猛角与猛董概况、澜沧县辖境。

虽周一人历边，英人仅允经行司格德所划线以东，遂无结果而回。”<sup>[28]</sup>

可见，张凤岐与严德一都认为此次调查“无结果”，成效不大。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英国阻止周光倬等人调查，只允许他们在红线（即英国司格德自划线）以东调查；二是两部派员内讧，并迟迟不就道。

通过研读日记，笔者认为张凤岐、严德一两人谈及导致此次调查“无结果”的原因，基本属实。

首先，因英方多次阻拦，周光倬被迫在昆明停留，在得到英国方面和云南省政府同意后，才得以正式出发。此次调查由王占祺负责与英方交涉<sup>[19]19</sup>。经王占祺与英方多次交涉，英方最终同意周光倬等人以私人身份前往，但是不能越过红线<sup>[19]48</sup>。同时，王占祺亦是沟通周光倬与云南省政府的桥梁，最后得到了省政府的同意<sup>[19]61</sup>。

其次，测量工作无法推进。几经周折，周光倬得到英国方面和云南省政府同意，计划前往考察，但测量工作与参谋本部派员李元凯产生分歧。李元凯认为测量实难进行<sup>[19]57</sup>，在王占祺的劝说下，周光倬“对于仪器天文测量，遂决定放弃”<sup>[19]58</sup>。正式出发之后，因测量之事，周光倬与李元凯再次沟通，但李元凯态度未变<sup>[19]111-112</sup>。身为勘界正使，李元凯负责勘界事务，因此测量工作无法推进，李元凯应负全责。所以说责任不在于周光倬，而是在于李元凯不愿配合。

不过，虽然张凤岐、严德一所说的原因的确存在，但是笔者不赞同他们所谓的“无结果”。虽然因李元凯不配合测量工作，测量工作确实是“无结果”，但是周光倬的调查工作是饱满且扎实的。具体理由如下：一是准备工作充分。周光倬充分收集了档案、志书、官员著书、地图，筹措了资金，拜访了相关官员及知名人士；二是在实地考察期间，周光倬采访了了解班洪事件的官员、亲历班洪事件的土司、曾参加滇缅南界勘界的人员，其工作思路与方法值得肯定。

此外，在《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中，周光倬提出的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意见，如会勘路线、会勘时间等，为后期滇缅南段未定界会勘工作提供了参考。

#### 四、结语

班洪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专员调查，以供交涉参考。从专员人选来说，外交部采纳了云南旅京同乡会的意见，弃用了尹明德。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因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省政府的特殊关系，外交部听取云南旅京同乡会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工作的推进；二是周光倬是地理教员，因地理又重实际，加之周光倬是云南人，是为合适的人选。

总体而言，此次周光倬的滇缅边界调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包括收集资料、筹措资金、拜访官员以及知名人士等。二是正式调查阶段。周光倬主要采访了三类人，对班洪事件了解的官员、亲历班洪事件的土司及参与过划界的人员。周光倬在昆明的准备工作细致完备，有利于更好地推进调查工作。在正式调查中，周光倬通过了解班洪事件的官员、身为亲历者的土司、参加过滇缅南段勘界的人员等，向土司赠送礼物，告诫土司寸土必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因李元凯的不配合，测量工作无法推进，从而影响了调查的成效，但不能说完全“无结果”。调查后，依据收集到的资料，周光倬完成了《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其对班洪地区的调查，有助于南京国民政府了解边地的真实情况。在分析班洪事件近因时，周光倬采纳了李曰垓等人的建议，资料来源可靠。周光倬的《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与张维翰的《拟陈滇缅界务意见书》有部分相似之处，体现了调查工作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同时周光倬也有自己的突破，其中部分“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意见”对后期的中英滇缅边界会勘有所帮助。

#### [参考文献]

- [1] 滇人对英兵侵占班洪之主张 民众外交后援会发表宣言 [N]. 申报, 1934-03-01 (10).
- [2] 王占祺函旅京滇人述交涉经过 [N]. 北平晨报, 1934-08-06 (4).
- [3] 旅京滇人组同乡会 [N]. 申报, 1932-01-12 (8).
- [4] 英侵滇矿事件 当局拟派员前往调查 旅京滇人商应付方策 [N]. 申报, 1934-03-18 (3).
- [5] 汪向中政会 报告中英外交 [N]. 大公报, 1934-03-22 (3).

- [6] 苏大成. 滇缅界务问题之回顾与前瞻 [J]. 新亚细亚, 1934, 8 (6): 45-46.
- [7] 滇疆界务纠纷 外参两部派员查勘 [N]. 申报, 1934-04-17 (3).
- [8] 滇籍军官报告滇疆界务沿革 蒋召李元凯赴赣咨询 [N]. 申报, 1934-04-06 (3).
- [9] 李景煜. 云南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一曲凯歌: 班洪事件简述 [J]. 云南社会科学, 1985 (3): 58-62.
- [10] 李国明. 民族精神: 云南沧源班洪抗英斗争胜利之本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1): 228-230.
- [11] 黄光健. 从反帝斗争看近代佤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9 (2): 12-14.
- [12] 张子建. 民国时期中缅边界问题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回响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1 (2): 141-146.
- [13] 白志红, 柳青. 民族·资源·国家: 中缅边境佤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J]. 思想战线, 2012 (4): 38-41.
- [14] 孙闯. 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论班洪事件对班洪佤族人国家认同的影响 [J]. 创造, 2020 (2): 19-25.
- [15] 洪崇文. 从班洪事件看云南边疆管理机构的运作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7 (3): 69-78.
- [16] 陈国保.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 (2): 132-142.
- [17] 陈力. 班洪事件新论: 以南京政府的应变和佤族的民族认同为视角 [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5 (12): 17-28.
- [18] 苑世林. 民国时期滇缅边区地理综合考察研究 (1934—1935) [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8.
- [19] 周光倬. 1934—1935 中缅边界调查日记 [M]. 周润康, 整理.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5.
- [20] 云南边地问题研究: 下卷 [M]. 昆明: 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 1933: 239-270.
- [21] 李生庄. 云南班洪问题之真相 [J]. 申报月刊, 1934 (10): 69-70.
- [22] 李曰垓. 滇疆界务说略并图 [M].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30.
- [23] 英兵二千侵占滇边之警耗 [N]. 申报, 1934-02-21 (9).
- [24] 段世琳. 班洪抗英纪实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199.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 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对外关系史料选编第二辑: 第19册 [M]. 北京: 蝠池书院, 2017: 453-455.
- [26] 滇缅勘界工作暂停 俟深秋瘴气消减方可再行前往 [N]. 申报, 1935-04-22 (3).
- [27] 张凤岐. 云南外交问题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76.
- [28] 严德一. 云南边疆地理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6: 19.

(上接第31页)

#### [参考文献]

- [1] 王利娟. 周作人“儿童本位”观的理论资源及脉络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 (6): 42-53.
- [2] 张静. 论罗兰·巴特符号学与视觉传播理论 [J]. 人文杂志, 2013 (9): 70-74.
- [3] 王泉根. 中国儿童文学概论 [M].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65.
- [4] 王人路. 儿童读物的研究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3: 119.
- [5] 郑振铎. 《儿童世界》宣言 [J]. 妇女杂志, 1922, 8 (1): 133-134.
- [6] 李林静. 《儿童世界》杂志探析 (1922—1941年)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4: 35.
- [7] 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 第13卷 [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40.
- [8] 吴平, 向敏. 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史事初探 [J]. 中国编辑, 2015 (3): 80-83.
- [9] 卢梭. 爱弥尔 [M]. 彭正梅,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
- [10] 祝平燕. 性别社会学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赵寅州. 近代报纸广告中的“儿童相”: 以1872—1937年《申报》为中心 [D]. 南京: 南京大学, 2020: 48-54.
- [12] 朱自强.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M].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241.
- [13] 吉登斯. 社会学 [M]. 赵旭东,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33.
- [14] 蒋风. 中国儿童文学史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63.